

《盛世危言》版本考

费成康

郑观应的传世之作《盛世危言》，是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著。由于郑观应曾屡次修订、重印这一著作，当时的社会又无版权观念，书商等人不仅随意翻印书籍，甚至自行改变卷次、增删文章，致使《盛世危言》的版本十分繁杂。

最早问世的《盛世危言》是五卷本。而书名仅有“盛世危言”四字的版本，都是此种五卷本。五卷本的卷首有郑藻如撰写于“壬辰（1892）八月中秋节”的序言，其中有“阅既竟，乃璧还原本，并劝其早付手民，出以问世”之句，表明在此时《盛世危言》尚未排字。在该版本的卷首还有“先后参定”该书的吴广霈、杨毓恂和陈炽分别撰写于“壬辰仲冬”、“癸巳（1893）暮春之初”的后跋及“癸巳七月”的序言，它们表明，在1893年阴历七月，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仍未付印。到中日甲午战争于1895年4月结束之后，郑观应于这一年年中或下半年为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撰写了《凡例》，其中指出，“今中日战后，时势变迁，大局愈危，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。距作书仅年余耳，而事已迥异”。这段文字显示，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的初版距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仅一年有余，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的首印应在1894年即甲午年春。由于郑观应往往将其著作的出版时间说得比实际时间更早，因此，《盛世危言》的问世不会早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的春天。

研究者们已注意到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最早的版本，是宏道堂刻印、卷首有“光绪甲午仲春付印”字样的版本。这一版本为五卷、五册，有正文56篇，附录16篇。不过，这一版本看来尚不是《盛世危言》最初的版本。

见存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中，还有个卷首也有“光绪甲午仲春付印”字样、但未指明出版者的版本。较之宏道堂本，这一版本多了正文《考试下》一篇，使正文增至57篇；多了附录《截录〈申报〉〈行军以间谍为先论〉》等三篇，使附录增至19篇。附录《行军间谍为先论》的原文《论行军以间谍为先》发表于《申报》1895年1月11日，因此，这一版本的付印必定是在1895年1月之后。对这一经过增订的五卷本进行研究后，还可以得出两个



结论。第一，这一版本是郑观应自己印刷的版本。第二，必定还有个郑观应自己印刷于“光绪甲午仲春”的五卷本。这两个结论基于以下的事实。

第一，该版本增添的一篇正文和三篇附录都以特殊的页码，即“福、禄、寿”或“上、下”，来插入书中。例如，正文《考试下》便以“福、禄、寿”三个页码插入卷一第26页与第27页之间。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，原来有个“光绪甲午仲春付印”的版本，1895年初这个版本尚未售完，或又加印了若干部，郑观应便于此时插入了增补的四篇文章。

第二，该版本中加盖了用来校订、增补原文的少量红字。在卷五第11页原文“日本易唐太岛”的右侧，有加盖的红字“即库页岛”；在卷五第27页原文“普法之役，人人皆有法国地图”之句第一个“人”字的右侧，有加盖的红字“普”，从而将原文订正为“普人皆有法国地图”。当著名的作者健在时，能对原文的错误进行修订的，特别是补充原文的，必定作者本人。因此，这一没有指明出版者的版本必定是郑观应自己印刷的版本。要是将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，即这一版本可能是其他书商的翻刻本，那么必要的前提是该书商必须有个郑观应亲自修订、增补的版本为其蓝本，否则他何以知道郑观应要对文章作出哪些修改，又何以获得他新写的《考试下》的手稿。同时，该书商也应早已印刷过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，而且没有售完这批书籍，并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照改郑观应新作的修订。显然，这样的可能性

是微乎其微的。

第三,还有一个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,它既没有标明出版者,也没有标明付印时间。该版本是增补了四篇文章的“光绪甲午仲春付印”本的重排本。在这个版本中,《考试下》等四篇文章都按照顺序排列了页码,原来用红字补在正文右侧的如“即库页岛”等少量文字,也都排入了正文。可见,郑观应自己印刷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至少有三个。他于“光绪甲午仲春付印”的版本,是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的第一个版本,“宏道堂”的五卷本是它的翻刻本。1895年初,他推出上述增补了四篇文章的五卷本。到增补本售完之际,他又重新排印了全书。此时,至少已至1895年年中,因而该版本的卷首未再印上“光绪甲午仲春付印”。在当时,书商等人在所印之书通常都会指明书局或出版者的名字。郑观应并非书商,因而这三个没有标明出版者,在增订、纠错方面又有明显关联的五卷本,显然都是郑观应自己排印的版本。

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,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于1894年8月出任江苏布政使的邓华熙在读了《盛世危言》后,十分欣赏,遂于1895年初将《盛世危言》奏呈御览。确定奏送该书系在1895年初的原因,是这一版本中已有附录《截录〈申报〉〈行军以间谍为先论〉》,同时邓华熙的奏疏则表明此时中日战争还未结束。在邓华熙奏早之际,郑观应已将五卷本的文章按照“富国类”、“开源类”、“强兵类”、“节流类”等四类重新分类,并分成十二卷。在邓华熙要将《盛世危言》奏呈给光绪皇帝时郑观应还为光绪皇帝度身定制了一篇文章:《论西学宜设特科》。于是,这一《盛世危言统编》共有正文58篇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盛世危言》中文章的题目都只有两个或三个字,唯独该文的题目有七字之多。这篇文章像是给光绪皇帝上的一个条陈,如果朝廷予以采纳,郑观应或许可中个“西学状元”,或许会被朝廷授予副主考一类的重要职务。还值得注意的是,邓华熙的奏折指出,他“并录原书一函五册,随折恭进”。^①在这里,他用了个“录”字,表明“奏呈御览”的《盛世危言统编》,是个手抄本。光绪皇帝对该书也颇为重视,将它发交总理衙门刷印,分给大臣阅看。随后,邓华熙又将这一“统编”送交于不久前由两江总督调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,张之洞便将该书“爱付手民,照缮刻布,以广其传”。^②因此,以往未为研究者们重视的《盛世危言统编》也是个重要的版本。它是光绪皇帝“御览”的版本,也是

他发交总理衙门印刷的版本,而《论西学宜设特科》一文也仅见于这一“统编”。

在《盛世危言》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后,郑观应便把他原版于1880年的《易言》36篇本改名为《盛世危言续编》,再次印刷出书。《盛世危言续编》与《易言》36篇最主要的差别,在于“续编”将《易言》中正文《论考试》一文的附录《论洋学》改为正文,从而使正文增至37篇。确定《盛世危言续编》付印时间的依据,是王韬所作的书序,该序写道:“《盛世危言续编》一书,乃杞忧生(‘杞忧生’是郑观应的别号)盱衡时事,思挽时局,幽愁愤积之所为作也”。该序的写作时间为“光绪乙未七巧日”,即1895年阴历七月七日。现今可以见到的《盛世危言续编》最早的版本,为上海赐书堂于“光绪乙未年夏月”校印的版本。这些情况表明,《盛世危言续编》确实问世于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。上海赐书堂的石印本分为三卷、三册。在石印这一“续编”时,该书堂还将冯桂芬等人辑著、翻译的19篇文章分为上、下卷,以《盛世危言外编》之名,附在《盛世危言续编》之后。此后,另一些书商将“续编”和“外编”合二为一,又将冯桂芬等撰写的文章增至29篇文章,并以郑观应的文章在先、冯桂芬等人的文章在后的顺序,将这些文章分为四卷、四册。这种四卷、四册的版本有1896年上海书局石印的《盛世危言续编》,1898年图书集成局铅印的《盛世危言二编》等。

郑观应将《易言》36篇本作为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的“续编”,其原因是明显的。郑观应推出《易言》36篇本时,当时的社会尚不能接受他效法西方的远见卓识。面对社会的压力和莫测的灾祸,郑观应急忙收回尚未售出之书,索回投赠给当道者的样书,还删去16篇可能会贾祸的文字,随即出版了主题局限于抵御外来侵略的《易言》20卷本。到光绪皇帝也认可《盛世危言》宣扬的效法西方的观点时,郑观应便能无所顾忌地重印十余年前遭到封杀的《易言》36篇本。由于郑观应将他所有论述时务的文章都视为一个系列,将《易言》称为《救时揭要》的“续集”,又将《盛世危言》称作《易言》的“续集”^①,因此到《盛世危言》成为名作后,他便利用“名牌效应”来重新包装《易言》。基于郑观应将其政论视为一个系列的事实,我们确实应将《盛世危言续编》作为《盛世危言》系列中的一种。

与此同时,因中日甲午战争后“势殊事异,情形已自不同”,郑观应“故复将未尽之言,奋笔书之”,又写出了一批新作。随后,他以《盛世

危言补编》之名，将45篇新作汇编出版。见存的“补编”均分为六卷、六册，它们中有“光绪丁酉（1897）孟夏仿泰西法石印”的版本，“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春三月图书集成局铸铅代印”的《盛世危言三编》等。由于这几个版本均问世于1897年之后，因而究竟是《盛世危言补编》问世在先，还是出版于1896年中秋前夕、正文增至104篇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卷本出书在先，成了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在研究见存的资料后，可知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的问世早于14卷本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。

理由之一，是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的卷首，有篇郑观应撰于“光绪丙午（1896）仲春”的自序。该序不仅表明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确系郑观应自己编定，而不是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出书后书商抽出郑观应增补的文章擅自编辑的一种书籍，而且表明“补编”完全可能初版于1896年春天或夏天，即早于十四卷本。

理由之二，是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新增的正文共47篇，《盛世危言补编》只包括其中的45篇，缺了《铁路下》和《议院下》两篇。在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中，《议院上》和《议院下》都编在卷五，到1900年在将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重编为八卷本时，郑观应将《议院上》和《议院下》提至卷一也即全书的第二、第三篇。由此可见，郑观应对这两篇文章何等重视。因此，如果是在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出书后郑观应再出版《盛世危言补编》，他不可能舍弃《议院下》这篇重要文章。唯一的可能，是在出版《盛世危言补编》时，他还未写出《议院下》等两篇文章。

理由之三，是在郑观应为“补编”所撰的自序中，有“冠以地球图说”之句。可见，在“补编”的卷首，便编入了那张有文字说明的《五洲各国全图》。这张地图也插入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的卷首，但郑观应却未在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的“凡例”中指出本书“冠以地球图说”。这表明“补编”的问世确实早于“增订新编”，读者通过“补编”已看到过这张地图，因而郑观应在“增订新编”中不须赘言。如果“增订新编”出书在先，郑观应必定会把“冠以地球图说”这六个字写入“增订新编”。

在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之前就有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的事实，使人们看清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特别是十二卷本与“续编”、“补编”的关系，就像是如今一部巨著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卷。这第一卷和随后的两卷是同样重要的。因

此，只注意《盛世危言》，而忽略“续编”、“补编”，显然是种疏漏。十二卷本的“统编”已将书中文章分为“富国”等四类，后来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也沿用了这样的分类；十二卷本中各篇文章的顺序，“增订新编”也未改变，只是“补编”中的文章根据其类别被分插到各卷中去。因此，《盛世危言增订补编》十四卷本实际上就是十二卷的《盛世危言统编》和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的修改、合订本。

见存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中，有扉页之后指明书名题写日期为“乙未秋八月”的版本，故而在以往有些研究者推测十四卷本始印于1895年。就像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有彭玉麒撰写于1884年的书序，但该版本并非初版于1884年一样，题写书名的日期未必就是书籍的出版日期。郑观应推出增补了四篇文章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以及《盛世危言统编》是在1895年初，推出《盛世危言续编》是在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，推出《盛世危言补编》已至1896年的“仲春”或“仲春”之后。根据这一时间表，可知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的推出时间当不会早于1896年年中。

要进一步考证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的问世时间，可从郑观应给陈炽的一封信件入手。该信指明十四卷本问世的时间是中秋前后：

《盛世危言》现将续集附入，分八本。已铸铅板，板费六百元，纸工在外，较刊板稍廉。约中秋节后成，容当多寄，以副雅望。^③

郑观应自己出版的十四卷本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与1900年出版的八卷本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都分为八册，但1900年的八卷本仅增加正文数篇，还称不上有“续集附入”，因而大约在中秋节后成书的版本必定是附入了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的十四卷本“增订新编”。同一时期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一封电报又表明这一版本成书于1896后。这封电报发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（1896年9月18日），其中有“弟托陈次亮送公‘增订危言’十部，俾转赠人”等句^④，表明“增订危言”即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的实际成书时间要比郑观应的估计略早数天，即成书于1896年中秋前夕。

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十四卷本共有正文104篇，即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的57篇，加上《盛世危言补编》的45篇，再加上尚未收入“补编”的《铁路下》和《议院下》两篇。在将这些文章汇编“增订新编”时，郑观应对正文大多作过若干修订，甚至是很大的修正。此后，全国各地也出现过多种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的翻刻本，它们在内容

方面并无增删,但往往与郑观应自己排印的版本有细微的差异。例如,剑南同德会于1897年刻印的版本改用了《盛世危言全编》之名,上海著易堂于1898年石印的版本改用了《增订盛世危言新编》之名,上海六先书局发兑的版本不仅改用了《增订盛世危言正续编》之名,而且将全书改为九卷、八册。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占京津地区,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剖豆分的危局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郑观应在对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中的文章再次作了修订,并在删除一篇文章、增加七篇文章后,仍以同样的书名将该书再次推出。1900年版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分为八卷,正文总数增至110篇。在以往,郑观应自己排印的版本均未指明出版者,这个八卷本则首次印上了“光绪庚子侍鹤斋重印”的字样,而“罗浮侍鹤山人”便是郑观应的另一个别号。

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八卷本也有多个版本。尽管有些版本的字体、大小、版芯几乎完全一样,但在仔细阅读后,仍可发现它们细微差异。同样是“光绪庚子侍鹤斋重印”的八卷本,有个版本的目录有较多的错误。例如,在目录上,卷一的正文《自强》之后并无附录,正文《交涉下》之后有附录《薛叔耘星使变法论》。但是在书中,不仅《薛叔耘星使变法论》系附在正文《自强》之后,还有《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》、《节录国民报公议第二篇》、《节录纯常子自强论》等三篇文章也都附在正文《自强》之后。另一个“光绪庚子侍鹤斋重印”的八卷本便改正了目录上的不少错误。同时,由于《胶报论普国中兴事略》一文中有若干较大的排印错误,如果重排此文,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,全部重排第一章后半部份的近40页,于是,郑观应未改动原文。但在卷一的末尾再次附上经过校订的《附论普国中兴事略》一文,使得“光绪庚子侍鹤斋重印”的八卷本至少可分为三个略有差异的版本。不过,尽管作过多次订正,“光绪庚子侍鹤斋重印”的八卷本仍有多处明显错误。例如,除最早的版本外,后来的版本在卷四的目录中都脱漏了正文《户口》,因而依据目录来作统计,该书的正文总数便减至109篇。

步入晚年的郑观应还将他的部分未刊文章和书信等编为《盛世危言后编》。《盛世危言后编》分十五卷、八册,由上海翰华阁书店铅印于1921年。这一“后编”并不是有一定思想体系的著述,而只是各类尚未刊文章的汇编。《盛世危言后编》流传不广,未见翻刻本,这不仅是因为此书的价值有限,特别是因为在当时社会已发生巨大的变

化,郑观应在中国思想界叱咤时代风云的年代已经过去。

综合上述情况,可知郑观应最初于1894年春天出版了共有正文56篇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。1895年初,他出版了将正文增至57篇的五卷本。接着,他将增加正文一篇、改编为十二卷的《盛世危言统编》的稿本送交邓华熙奏呈光绪皇帝。不久,该版本遂由官府出版。1895年秋,郑观应推出由《易言》36篇本脱胎而来的《盛世危言续编》。1896年上半年,他又出版了由45篇续写的文章编成的《盛世危言补编》。到了1896年下半年,他将“统编”与“补编”合在一起,并增入两篇新写的正文,出版了十四卷本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。1900年,通过再次修订,他推出了同名的八卷本。这样的过程,便是《盛世危言》各个版本出版的总脉络。至于《盛世危言》究竟有多少不同的版本,在今天已很难断言。如上文所述,郑观应自己付印的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八卷本至少都有三个版本。那时的书商等人更是任意翻印《盛世危言》,还任意增删其中的文章,改变全书的卷次。由于时隔一个多世纪,其中的若干种可能经不住一百余年的雨打风吹,迄今已全部灰飞烟灭;另外若干种或许幸存了下来,但可能被搁置在尘封的书架上或被压在书籍的底层,不知何年何月才会重见天日。因此,《盛世危言》究竟有过多少个不同的版本,也许会成为历史之谜。^⑤

附记:本文作了两个推论。其一是存在着郑观应自己印刷于1894年春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。其二是存在着1896年上半年付印的《盛世危言补编》。本文脱稿后,作者在南京图书馆中发现了1894年春郑观应自己印刷的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,即《盛世危言》的第一个版本,第一个推论已被证实。于是,作者增加了对第二个推论的信心,期待在将来能找到《盛世危言补编》最早的版本。

注释:

- ①邓华熙奏折,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八卷本,光绪庚子侍鹤斋重印本,卷首。
- ②张之洞序,《盛世危言统编》,光绪戊戌年孟春月天保山房校刊本,卷首。
- ③郑观应:《盛世危言后编》,上海翰华阁书店1921年本,卷四,页18。
- ④陈旭麓等主编: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*汉冶萍公司》(一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本,第219页。
- ⑤从20世纪80年代起,又有上海人民出版社、辽宁人民出版社、青海人民出版社、蓝天出版社、中州古籍出版社、中国戏剧出版社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重印过《盛世危言》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)